



结束语

当今世界，妇女的作用日益突出，对于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公民社会组织、国家、政界、乃至国际发展机构的影响日益显著。得到妇女运动有力支持的民主化进程彻底改变了妇女组织参与政治活动的各项条件和限制。尽管在最初阶段遭遇挫折，丧失动力，但有关方面已经调整并修订了策略，力图协助妇女在民主规则下争取政治权利。随着更多的女性进入国家立法机构、市政委员会和其他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任职，既有利于在世界各地深化民主进程，同时也开创了重要的机会，让女性议员和委员在制订国家及地方决策时能够提出不同于男性的工作重点。

女性政府官员和女性议员致力于将妇女运动提出的各项要求结合起来，修订国家法律，提供生殖保健服务，保护生育权，禁止针对妇女的暴力和歧视，无论此类现象发生在哪里，元凶是谁。在国际法庭上以危害人类罪的名义对战争期间的性侵犯行为提出起诉，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对此类暴行负责的国家行为者从此不仅要面对本国公民的指控，更要面对国际社会的惩罚。

有了上述政策变化和立法改革，再加之家庭和文化习俗历经长期社会变化，使得妇女能够进入更广阔的公共领域。北京会议结束十年之后，我们的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但危险依然存在。在北京会议召开十周年之际，新自由主义思想持续主导着某些重要的决策

领域，近期地缘政治发生变化，新形式的宗教政治在全球、国家和国内层面日益兴起，所有这些都是妇女运动需要思考的问题。妇女努力推动社会变革的雄心壮志可能要让位给安全考虑。跨国妇女运动网络在多边框架下多年来精心培育全球妇女权利体系，但这一多边框架如今正遭到单边主义的侵蚀。在意识形态两极对立的情况下，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国内不同意见受到压制，妇女团体和妇女运动要想保有自主空间，解决性别平等和自由等存在争议的重大问题，就必须采取灵活的政治立场，同其他社会运动、政党以及国家结盟。

经济自由化

本书反思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各项成就，重点关注发展政策如何加深或减轻妇女的从属地位。书中指出，主流政策观念及其对货币和财政紧缩的重视，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众多因素之一。

经济自由化进程始终受到质疑，在宏观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领域可以开展各种政策实验，另辟蹊径。无论是迫于华盛顿的压力，还是出于自愿，决策者遵循正统教条的结果往往令人失望，甚至连策划者的估算也很难令人满意。国家削减了对农业的支持，而得到补贴的大型生产商咄咄逼人，造成农村生活日益不稳定，同时也更加多样化。一旦全球商品市场变化无常，或是市场萧

条，大批人口将陷入贫困、饥饿，甚至出现饥荒。

世界各地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同样伴随着不安全感，“灵活性”意味着降低劳动标准，而不是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达到完美平衡。由于公共卫生和公共福利方案软弱无力，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保障机制漏洞百出，妇女和女童不得不付出更多无偿劳动来照料家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由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女性的这种负担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个迅速实现商品化的社会里，全体家庭成员，无论男女老幼，都更加需要获得有偿劳动，支撑家庭日常开支。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有些经济政策纲领一方面给公众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但同时也为包括低收入妇女在内的某些社会群体开创了新的机遇。世界各地的出口型制造企业和生产“高价值”出口型农作物的大型农场提供了就业机会，尽管此类工作可能朝不保夕，薪水微薄，工作条件恶劣，但还是有些妇女从中受益。通过工作，这些妇女获得了第一份可支配收入，走出宗族和社区的小天地，接触到新的社会关系，年轻妇女可以借机推迟婚期，攒钱改善今后的生活，投资于子女的教育，或是在家庭资源分配问题上拥有更多发言权。这种现象固然不能彻底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也不能消除女性对于男性保护的依赖，但某些妇女至少掌握了某种工具，可以撼动宗法社会的基石。对于拥有更多资金和资源的人来说，市场自由化创造了贸易和投资的机会，可以在自己名下购置土地和房产，并将其留给子孙后代，或许可用这种方式换取步入老年之后的保护和保障。

对于绝大多数妇女而言，只要市场仍然是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性别平等就是一个遥远的梦。

要实现性别平等，需要加强公共问责制度，实现相互保障，避免权利落空。这就需要给以下领域投资：运转顺畅、平易近人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服务；能够保护妇女就业岗位和工作条件的劳动标准及劳动权利；由公立部门开办多种补充性服务，支持妇女照料家人的工作（供水、供电、卫生设施、修路、儿童保育）。对此，主流经济观点是决不会赞同的。

享有实质性权利和待遇，意味着启动一个负责任的进程，能否获取资源不再由政府官员发号施令，不再取决于保护人的关照或是丈夫的好意，也不再听命于垄断供应商的定价权。¹ 当个人同家庭、婚姻、市场和雇主的关系变得不可接受的时候，摆脱对于这些关系的依赖，代之以切实可行的制度选择，求助于公共部门的非国家行为者，这才是真正获得权利。这意味着实现就业权，从事体面的工作，利用丰厚的津贴为年老、疾病、残疾、需要护理等人生当中的各种不测事件未雨绸缪。这还意味着由男女双方以更加平等的方式分担无偿护理工作，重新界定全日制工作的定义。

收服自由主义？

在反对自由主义纲领的普遍声浪当中，人们更多地关注社会政策和施政问题。某些决策者认为，假如全球化进程持续发展下去，通过社会政策和政治改革必定能够“驯服”或“收服”这匹野马。² 但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牢牢控制着某些最有影响力的决策领域，促成这种积极变化的可能性丧失殆尽。³

当前经济政策制造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范围之广，大大超出了有关方面提出的补救措施。结构调整时期尽量缩小社会保障网络的种种弊端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但有些解决方案很可能

重蹈覆辙。在开放贸易（降低进出口税）和流动资本（降低公司税、资本收益税和所得税）造成压力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难以筹集开办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也很难调动资金来弥补经济政策造成的损失。总而言之，部门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缺乏相似性和互补性。

有效的施政不等于缩减政府的作用，这一点日益得到广泛认可。新自由主义改革纲领的奠基人也开始批评新自由主义政策未能解析“政府”的不同层面，没有区分政府规模和政府实力。⁴ 即便按照国际金融机构的狭义政府定义来衡量，能够规范私营产业和商品化社会服务、灵活机敏、体察民情的政府，就可称得上是高效能政府。这就意味着提供培训、工资和动力。

人们开始明白，施政改革所设想的现代国家——政府机构和司法系统精简廉洁、市场竞争自由有序、个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合同如约落实——在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从未真正实现。⁵ 发展中国家为促进改革，正在推行机构改革“蓝图”，然而至少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做法未必能够促成私营部门生机勃勃。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复杂无序，“单一”⁶ 体制可能导致施政改革陷入与经济改革同样的困境。⁷

但有越来越多的势力正在联合起来，要求国内市场和国家体制照搬这种抽象模式。这种近乎完美的国家和市场概念没有给性别平等问题预留位置。所谓“抽象市场”和“理性—合法”国家的概念基础是理性、不受牵制、能够自由选择的个人。正如本书分析指出，女性不符合这种模式。她们承担着赡养和照料的责任，她们的政治“发言权”因性别歧视体制和某些施政改革提出的有限参与概念而受到压制。

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纲领

由于各国制度、历史、社会和政治情况各不相同，政策建议不应重蹈正统方略的覆辙，一定要避免“一刀切”的做法。⁸ 制订性别平等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门学问，没有简单的套路可循。但宏观经济政策有必要遵循某些指导原则：牺牲增长和就业机会的通货紧缩政策是不可取的，务必将平等和宏观经济稳定作为决策的核心目标，确保部门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保持相似性和互补性。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经指出：

“金融保守主义具有清晰的逻辑和严格的要求，但是必须根据总体政策目标来阐释其各项要求。公共开支可以创造并保障多种基础职能，这种作用必须得到重视，并且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性联系起来。事实上，必须在社会目标的大框架下评估宏观经济稳定状况。”⁹

经济增长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筹集再分配政策所需资源创造了必要条件，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实现性别平等。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受到普遍赞誉，不同社会阶层和家庭之间的资产及收入分配实现了相对平等，但在性别关系及其结果问题上远没有做到平等。这并不是说经济增长和性别平等是一对内在矛盾，而是要着重指出，某些经济增长模式很可能与极端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同时出现，甚至以后者为前提。例如，高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吸引更多妇女就业，但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划分依然存在。由此可见，政府需要制订针对性更强的政策，协调经济增长和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规范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规应该着力于清除性别歧视的社会规范，消除造成性别分割的歧视因素，打破阻碍妇女进入广阔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障碍。

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增加政府收入的税收政策无法保证这些资源能够用于促进性别平等。要确保公共开支确实能够以平等的方式用于支持妇女和女童，妇女能够从社会保障机制中受益，就必须制订性别政策目标和相关机制，保证公共开支一定要用于上述领域，并提供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协助减少妇女的无偿劳动时间。

在某些地区，国家议会和地方政府当中的女性比例极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界女性必将利用性别预算举措或其他方式来推动妇女权益。很多因素决定着担任公职的妇女能否积极响应性别平等事业，这其中包括她们进入政界的方式是否会阻碍她们顺应女性选民的希望，以及她们的政治资本能否要求政党将性别平等问题纳入纲领。女性政治家能否有效地推动性别平等事业，还取决于能否改革司法、审计、立法、行政等政府机构，将实现社会公正和性别平等作为公务制度的业绩衡量标准。

正如上文指出，假如经济改革和施政改革忽视了保护人权，没能切实增加参与机会和促进民主进程，就很难将性别公正作为公务制度的衡量标尺和奋斗目标。假如重要的国家职能实现私营化，经济全球化限制国内决策空间，“规范市场”的国家行为能力就将寿终正寝，¹⁰ 担任公职的妇女将性别平等问题纳入公共政策的能力也将因此大为减弱。

现在哀悼国家的消亡，还为时太早。事实证明，自由化市场及国家改革政策破坏了民众生计和国家稳定，再加之自由化纲领本身存在很多矛盾，各方开始重新评估这些政策。此外，民主化和全球化提高了公众对于国家职能的期望值。各国民众希望，增强问责制、提高透明度和公开性等原则不仅适用于商业交易，还应普遍应用于公

立和私营机构。全球化意味着争取权利的各项斗争不再局限于国家层面，而是深入国家内部并超越国家界限。在全球机构和地方政府体制的支持下，妇女伸张正义的斗争现在能够获得国际和地方的双重关注。

帮助妇女获取资源和伸张正义，将有力地推动性别平等事业的支持者在国家层面上制订并推行关于妇女权利的进步法律。在处理卢旺达性暴力和国内暴力冲突的问题上，这种多重管辖策略表现得尤为突出。¹¹

国家始终是、而且必将是保护权利的重要因素，哪怕国家的行为方式和机构体制需要彻底改革，以实现性别公正。¹² 国家制订法律，规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假如市场原教旨主义削弱了国家在这方面的合法性，那么国家作为推动社会改革和推行性别平等标准的最重要机制的作用也会相应削弱。

脆弱、失政或发生内部冲突的国家，是性别平等事业面临的艰巨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在今后若干年内给予密切关注。假如提供基础社会服务等重要国家职能交由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负责，国家建设及巩固和平进程听命于国际参与者制订的规划蓝图，而且国内妇女运动力量薄弱，要求社会各界就性别公正问题达成共识就会非常困难。¹³

在国家无法提供服务或是国破家亡之际，人们不得不向传统或非正规社会机制寻求保护，保守的性别关系理念就会死灰复燃（或是从无到有）。这些非正规机制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能够接替国家，以灵活巧妙的方式提供各种服务，有效地维护社会成员的尊严和社会意义。由此可见，在冲突后局势或国家失政的情况下，务必要吸纳

这些机制共同参与社会重建进程，重塑社会凝聚力。

假如传统机制具有浓厚的宗法社会特点，要将性别平等问题（或涉及面更广的社会平等问题）纳入重建进程会很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¹⁴ 要求传统机制在社会平等问题上符合宪法标准，南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国家有必要在各种社会机制当中提倡性别平等。但脆弱或失政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将非常困难。

由此可见，善政和平等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支持，都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要建立安全的国家和能够包容多样性及差异性的社会，善政和平等必不可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和国家改革方案回避了不平等问题。包括性别不平等在内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在短期内有助于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从长远观点来看，不平等将严重削弱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破坏社会凝聚力，甚至助长极端主义的政治行为，造成社会动荡。

注释

1 Elson, 2002。
2 ILO, 2004d; Ruggie, 2003。
3 Molyneux, 2002。
4 Fukuyama, 2004。
5 Upham, 即将出版。
6 Evans, 2004。
7 Mkandawire, 2004。
8 Rodrik, 2004。
9 Sen, 1999:141。
10 Wade, 1990。
11 Goetz and Jenkins, 2004:第二章和第四章。
12 Molyneux and Razavi, 2002b。
13 Kandiyoti, 2004。
14 Kabeer, 2002。